



中山大學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工作简报

第六十二期

二零二四年四月编印

目 录

中心动态

- 徐长福申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
- 凌菲霞申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
- 杨兴升申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
- 户晓坤文章被《哲学原理》转载……………1
- 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大卫·麦克莱伦教授来访……………1
- 马天俊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哲学前沿”课程做讲座……………2

学术活动

- 实践哲学讲堂第 39 期综述……………3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69 期综述 ……………9

学术成果

- 杨玉昌：《尼采对理性疾病的诊断与治愈——从当代哲学践行的视角看》……………17
- 卢家银：《互联网平台私法责任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2010-2022 年隐私与个人信息纠纷裁判文书分析》……………17
- 卢家银：《同意原则在网络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研究——〈民法典〉第 1035 条释评》……………18
- 刘宇：《悲剧、实践智慧与幸福——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实践哲学》……………18

●田书峰：《亚里士多德论营养灵魂》·····	19
●田书峰：《理性与爱欲：〈理想国〉与〈会饮〉中的两种灵魂图景》·····	19
●凌菲霞：《马克思中学时期哲学世界观的习得与发展创新——基于马克思与中学同班同学德语论文的对比》·····	20
●叶甲斌：《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	20
●叶甲斌：《“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与范帕里斯论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	21
●盖伊·斯坦丁著，张超译、叶甲斌译校：《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	21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

邮编 510275

责任编辑：陈思静、张闻清

校对：叶甲斌、李婷婷

◆中心动态◆

徐长福申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23年10月16日，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被正式批准，立项课题为《全球现代化史的哲学考察——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23JJD720004）。

凌菲霞申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4年2月21日，中心成员凌菲霞副研究员申报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被正式批准，立项课题为《欧洲马克思传记史研究》（GD24YZX05）。

杨兴升申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4年2月21日，中心成员杨兴升讲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申报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被正式批准，立项课题为《明清时期中国棉纺织业核心技术发展动力的研究》（GD24YZL03）。

户晓坤文章被《哲学原理》转载

中心成员户晓坤教授的文章《竞争的强制规律——资本内在趋势的实现及其物化批判》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24年第1期全文转载。文章原发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

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大卫·麦克莱伦教授来访

2024年3月8日至10日，应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邀请，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教授来访，开展学术讲座和交流。麦克莱伦是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政治理论名誉教授，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在欧美有广泛的影响，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被公认为英语世界研究马克思生平、思想最权威的研究文献之一，是第一部涵盖了马克思生活各个方面的英文传记。

3月9日上午，麦克莱伦教授在实践哲学讲堂第39期开讲，主题是“马克

思的需要概念及其当代意义”。3月10日上午，麦克莱伦担任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69期的评论人，该期的主讲人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凌菲霞副研究员，主题是“欧洲经典马克思传记对唯物史观的诠释——与麦克莱伦教授商榷”。

马天俊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哲学前沿”课程做讲座

2024年4月3日晚，中心成员马天俊教授主讲了中山大学哲学系2023级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题目为“当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纲领再审视”。本次讲座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室举行，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户晓坤教授主持。

◆学术活动◆

实践哲学讲堂第 39 期综述

2024 年 3 月 9 日上午，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荣休教授、国际知名马克思学研究专家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实践哲学讲堂第 39 期开讲，题为“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及其当代意义”。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暨哲学系李萍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和陈思静博士生担任翻译。本期讲堂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 103 讲学厅举办，于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共有约三百人参与。



（讲座现场）

报告开始前，主持人李萍介绍了麦克莱伦的学术成果及其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感谢麦克莱伦多年来对中山大学哲学系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给予的支持。



(大卫·麦克莱伦教授主讲)

麦克莱伦阐发了马克思需要概念的文本解释、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以及它的当代意义。

第一，需要是马克思的一个核心概念，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在旗帜上写下这样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类将需要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性的构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区分了固定欲望（constant desires）和相对欲望（relative desires），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前者只是发生了变化并获得正常发展的机会，后者则会因为被剥夺了生存条件而被摧毁。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欲望是无限的，而需要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都是有

限的，同时需要又是发展的，因此一个以需要为基础的社会在经济增长方面可以非常灵活。基于此，他进一步讨论了工人阶级的激进需要、劳动本身是否是一种关键性需要等问题。

第二，如果将需要置于马克思的设想的中心，它将取代平等、权利等概念或至少使这些概念相对化了。在需要占主导即“按需分配”的社会中，需要之间没有可通约性，所以资源不是均匀分配的。但资源可以足够丰富以至所有人都能得到自己所需的份额，正如马克思所说：“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第三，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如何能帮助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等当代问题？麦克莱伦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提供了未来生活的理想或模型的乌托邦。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其有关“现实的运动”的思想经历了更迭。从 1845 年到 1858 年，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理解发生变化，前期认为历史发展是单线的，后来则转变为多线性的。上述讨论引出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危机问题，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对全球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所带来的。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框架能够应对环境危机的挑战？麦克莱伦认为，目前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基于利益集团的自由议会民主无法应对环境危机。他引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的观点表明，合作的社会主义是最能有效应对危机的政治安排。詹姆逊的“强大而坚定的（社会主义）政府”可以改变人们的欲望，而需要不容易被改变，需要是由人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的类型决定的。因此，马克思的需要概念所揭示的是，解决当前危机的路径不仅在于财富再分配，更在于形成使人们过上充实的、非异化生活的社会，对新社会的可能性的关注甚至应超过政治和经济维度。



(李萍教授主持)



(马天俊教授评论)

报告结束后，评论人马天俊向麦克莱伦先生这位学术常青树表示钦羡，向他在自由世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和发挥表示赞佩，向他多年与中大马哲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中给予诸多师生的教益和帮助表示谢意。关于报告内容，他有三点评议。首先，麦克莱伦基于马克思的整体思想讨论需要问题，特别聚焦于当代的环境危机问题，这的确是重要议题。其次，麦克莱伦对自由议会民主体制的批评衍生出对某种公社式社会的建议，这种新生活之义理和可行性究竟如何？因为曾有的某种公社生活其实是环境不友好的。最后，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曾谈到货币既是贪婪的对象又是贪婪的根源，这主要是现代性现象，其历史意义及其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如何？

麦克莱伦对评议逐一作了回应：第一，这场报告的确主要基于成熟马克思的思想，同时，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之间存在连续性，只是晚期著作与环境危机的问题更为相关。麦克莱伦还指出气候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紧迫性。第二，詹姆逊所提到的“世界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麦克莱伦想强调的是，气候危机的问题需由一个有着威权手段的强大政府来解决，但这样的政府也需要听取民意，不能把意志强加于民众之上。关于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思考，马克思主要肯定了农村公社中的土地共同所有权，认为其可能是

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一。第三，马克思的作品的确忽略了货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问题。



(提问环节)

在开放讨论环节，现场师生及线上观众与麦克莱伦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活动现场：徐长福教授发言，凌菲霞副研究员翻译)

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教授、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向大家介绍了本次麦克莱伦来访的总体安排,并预告3月10日上午麦克莱伦将参加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69期,并担任评论人。徐长福感谢麦克莱伦的精彩讲座,期待国内学者在与国际学者的对话中不断提高自身学术能力。

主持人李萍作了总结发言,强调麦克莱伦的讲座对理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重要的思考。最后,李萍宣布本期讲堂圆满结束,并向麦克莱伦赠送纪念海报。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69 期综述

2024 年 3 月 10 日上午，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69 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 103 讲学厅举行。本次讲堂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凌菲霞副研究员主讲，题为“欧洲经典马克思传记对唯物史观的诠释——与麦克莱伦教授商榷”。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徐长福教授担任主持人，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荣休教授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陈思静博士生担任翻译。本期讲堂于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共有约 130 名师生参加。



（徐长福教授主持）

报告开始前，主持人徐长福介绍了此次研习会的设计意图，即邀请麦克莱伦点评凌菲霞的报告的原因。凌菲霞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麦克莱伦，题为《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方法论视角的考察》，她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到英国访学期间还受到麦克莱伦的亲自指导。这种密切的学术联系正是本次研习会如此设计的原因。他希望本次研习会能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进一步推动学术发展。



(凌菲霞副研究员主讲)



(讲座现场)

凌菲霞主要阐明了经典马克思传记作者梅林、滕尼斯、以赛亚·伯林、麦克莱伦关于唯物史观的四种不同诠释。凌菲霞首先说明了她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解，即唯物史观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抽象对立，既以物质客观性为前提，又不乏能动性意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四种唯物史观诠释的主要标准。

在《卡尔·马克思：人生故事》（1918年）里，梅林很好地领会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的基本意图，深入地阐发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认识的客观性。然而，他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发现唯物史观关于主客辩证互动的思想。卢卡奇批评梅林简单地处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和手稿，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主客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只有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观点”出发才能产生“对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换言之，唯物史观关于劳资对立和无产阶级革命等观点，实质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梅林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关于无产阶级主体与经验客体之间关系的理解。

在《卡尔·马克思：生平和学说》（1921年）以及其他马克思研究中，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不仅反对批评家对唯物史观的还原论和决定论解读，还反对他们拘泥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二元结构的做法，认为要强调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三元划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将这种三元结构应用到他关于欧洲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中。他将自身的共同体-社会理论与上述三元结构综合成一种分析框架，从经济、政治、精神三个方面分析了个人从“共同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归属于带有抽象普遍性的“社会”的辩证过程。总之，滕尼斯辩证地理解主客关系，强调人的实践在社会构成和历史变迁中的根本作用，内在地契合了唯物史观的主客辩证思想。

滕尼斯和马克思关于未来人类共同生活形式有类似的构想。滕尼斯提出未来新文化时代或新共同体形式（以工人阶级的胜利为特征），它类似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然而，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未来还是历史辩证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滕尼斯却不认同这种必然性。滕尼斯的新文化时代理想实质更像康德的调节性原则。

以赛亚·伯林在《卡尔·马克思：生平和环境》（1939年）以及后来的马克思研究中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结为一元历史观。他把唯物史观视作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认识论，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过于轻视种族、民族、传统和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并将这些因素贬低为在历史上没有独立作用的上层建筑或者副产品。在方法论上，伯林认为马克思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并将之视为探索历史规律的唯一途径，例如，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抽象的范

畴、理想化的人群，是做了特殊规定后构建的阶级。在伯林看来，马克思这样做跟自然科学的方法一致，即关注“类”、相似性和规律；但伯林认为人文科学应关注个别现象或个人独特性。最后，伯林指出马克思的价值一元论，即认为人类的理想只能是共产主义，而不能是其他方案。

伯林显然也只是强调唯物史观以物质客观性为前提的观点，忽视了它的主客辩证思想，所以他将唯物史观归结为一元历史观并加以批评的做法并不恰当。然而，伯林至少展示了唯物史观建设性的一面，即它“彻底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和发现真理的方法”。这也是伯林使马克思研究在英文学界受到尊重的原因。

麦克莱伦在《卡尔·马克思：生平和思想》（1973年）和其他马克思研究中以更同情、全面的角度理解唯物史观。梅林、伯林、滕尼斯在解释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时，都只是注意到马克思的如下观点，即“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然而，麦克莱伦却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更丰富、复杂的观点，他说马克思在把国家描述为阶级统治工具时承认有例外情况：“马克思有时认为，国家不必代表整个阶级，而只代表该阶级的一部分（例如，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金融家）；他有时也认为，一个阶级可以为了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控制国家（例如，代表英国中产阶级的辉格党）。在阶级尚未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马克思认为国家可以发挥独立的作用”。

麦克莱伦尽管也指出唯物史观的解释局限，但是却充分肯定了它对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力以及它看待历史的独到视角和方法。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著作的思想力量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著作的概念结构意味着它不适合处理不具有明显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他指出，唯物史观不同于唯心主义或个人主义书写历史的方法，它解释历史的出发点是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和人们的物质需求，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分析法。总之，麦克莱伦的研究使得马克思研究在英文学界流行起来。



(麦克莱伦教授评论)

报告结束后，麦克莱伦对报告的四个部分进行评论：

第一，麦克莱伦赞同关于梅林的主要评价，包括卢卡奇对梅林的一些批评，并补充称，卢卡奇是 1920 年代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复兴的最突出理论家之一。

第二，麦克莱伦说他对滕尼斯的马克思研究并不熟悉。滕尼斯的一些观点看上去似乎与唯物史观并不兼容。麦克莱伦反对说滕尼斯思想是康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的综合，因为他认为康德和马克思的融合是不可能的。麦克莱伦主要参考 19 世纪末就已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争论，并认为作为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康德式伦理学无法结合，除非主讲人这里提的是其他意义上的结合。

第三，麦克莱伦认为伯林的马克思传记实质对马克思有很多理论上的同情。关于唯物史观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麦克莱伦指出，在翻译马克思的作品时，要注意英文词 Science 与德文词 Wissenschaft 之间的区别，后者的含义要宽泛得多。人们从恩格斯作品那里获得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的理解更倾向于前者，即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近的科学。麦克莱伦则更倾向于用 Wissenschaft 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即强调一种连贯的、一致的、合理的结构和思维。

第四，关于麦克莱伦本人的唯物史观解读，他承认他在《马克思传》提供的解释与他 1971 年的《马克思思想导论》里关于唯物史观的专题解读有一些出入。他也再次强调 G.A.科恩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的区分的重要性。麦克莱伦曾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里提出，种族、民族乃至性别划分可能比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更适合于社会现实分析，但现在他倾向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视角，并认为劳动阶级被剥削的状况仍是其贫困的原因。

凌菲霞回应了麦克莱伦的评论。首先，关于滕尼斯的唯物史观诠释，要结合其社会学基本思想，特别是其意志理论加以理解。滕尼斯和马克思实质都超越了传统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对立，不仅把物质客观性作为基础和前提，还强调人的能动意志。滕尼斯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一种社会哲学，这种理解既先于又不同于卢卡奇、葛兰西等实践理论家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滕尼斯关于唯物史观缺乏伦理考量的批评、他对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理想主义的反对、他在历史目的论上的模棱两可态度，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次，伯林在早期，包括在他写作马克思传记的 1930 年代，的确对马克思表现出更多的同情。需要加以区别的是，作为理论家的滕尼斯和伯林，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借用或批评来论证对应的社会学理论和自由学说的，他们往往只关注并利用唯物史观的某一方面。这不同于以解释为主的梅林和麦克莱伦，因为他们更全面地了解唯物史观的诸方面，并发现其中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现场提问)

评论环节结束后，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谭群玉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罗曼予老师、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曲轩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叶甲斌博士后、饶琳博士生等与会师生就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女性主义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争论等问题与主讲人和评论人进行了交流。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最后，主持人徐长福作了总结发言，对凌菲霞和麦克莱伦表示感谢，同时感谢线上线下的学友对活动的支持与关注，宣布本期研习会圆满结束，并向麦克莱伦赠送纪念海报。

◆学术成果◆

杨玉昌：《尼采对理性疾病的诊断与治愈——从当代哲学践行的视角看》

中心成员杨玉昌副教授在《世界哲学》2024年第1期发表文章《尼采对理性疾病的诊断与治愈——从当代哲学践行的视角看》。文章指出，尼采继承和发展了叔本华对理性的批判，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中源于苏格拉底的理性导致了生命的自我否定、自我消耗和自相矛盾，成为一种危害生命的疾病。在尼采看来，理性的基本谬误是僵化，即把相似视为相同，否定了作为生命的最基本原则的生成，使得生命沦为病态。治愈理性疾病的途径是恢复对人的感性能力的信任，通过关注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重建人的身心健康。从当代哲学践行的视角看，尼采提出的理性疾病的治愈之道无论在理论思想还是具体实践上都有着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

卢家银：《互联网平台私法责任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2010-2022年隐私与个人信息纠纷裁判文书分析》

中心成员卢家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1期发表文章《互联网平台私法责任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2010-2022年隐私与个人信息纠纷裁判文书分析》。文章指出，随着平台“数字守门人”功能的逐步凸显，现行制度日益要求其积极承担保护信息隐私的责任。本研究在全面检视私法责任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对2010年以来隐私与个人信息诉讼裁判文书进行了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内容分析，剖析了网络平台在该类纠纷中的败诉裁决与私法责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行为层面，平台的主观过错和权益损害程度越严重，越会被判败诉和承担私法责任；与事前告知许可义务相比，事后积极履行监管救济义务的平台，普遍能够获得胜诉并较少被判承担侵权责任。在主体层面，平台规模也制约着其在侵权诉讼中的胜败诉判决和责任承担，相较于大型平台，中小型平台在法庭上更容易被判败诉和承担去除侵害与损害赔偿赔偿责任。

卢家银:《同意原则在网络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研究——〈民法典〉第 1035 条释评》

中心成员卢家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发表文章《同意原则在网络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研究——〈民法典〉第 1035 条释评》。文章指出，同意原则是互联网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它直接制约着用户数据隐私的保障限度。《民法典》第 1035 条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需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通过对冲突利益的平衡，以基础法的形式阐明和确立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适用标准。同意原则反映了信息主体对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的自我治理，体现了主体对自身道德权利的享有和个人自治的实施。它不仅包括对一般个人信息处理默示授权的弱同意，而且包含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明示授权的强同意。此外，同意原则在网络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适用还受到公共利益、“合法、正当、必要与诚信原则”和信息公开等因素的限制。

刘宇:《悲剧、实践智慧与幸福——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实践哲学》

中心成员刘宇教授（西北大学）在《道德与文明》2024 年第 1 期发表文章《悲剧、实践智慧与幸福——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实践哲学》。文章指出，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界定为灵魂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但在伦理学中并未阐述实现活动是如何展开的，是如何实现幸福的。由于运气的存在，德性本身并不能保证幸福。这个任务是通过《诗学》中对悲剧的系统论述来完成的。悲剧主人公具有较好的习俗德性，但因缺乏实践智慧而尚未形成完满的德性。当其信守习俗德性并执着地进行合乎德性的行动时，便可能遭遇德性的单一性所不能容纳的实践复杂性，进而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通过编制一个完整的悲剧情节，实践的整个过程得以被统观，从而使人们能够理解习俗德性的局限性。这种理解培育着悲剧智慧。将悲剧智慧把握到的实践整体意义结合到当下情境的实践之中，便孕育着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把握住每一个具体实现活动的善及其与整体善的关联，由此便可能超越实践中的运气带来的不幸，走向幸福。就此而言，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实践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说伦理学论述的是幸福的可能性，那么诗学则论述了幸福的现实性。

田书峰：《亚里士多德论营养灵魂》

中心成员田书峰副教授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发表文章《亚里士多德论营养灵魂》。文章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把灵魂界定为潜在地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第一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就体现在灵魂的不同功能和部分上，这包括营养、感觉、理性、欲求和位移运动等功能，其中，灵魂的营养功能是最根本的，但营养灵魂的功能不只是吸收营养，还包括生殖。本篇论文主要论述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亚里士多德在II 4的开端提出了双重优先性的研究方法，现实活动优先于能力或潜能，而对象又优先于现实活动，但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营养灵魂的讨论并没有遵循这个方法，而是把营养能力视为优先的，它才是自然生命体生长和生殖的原因或本原。第二，既然营养灵魂的功能更在于生殖，为什么这个灵魂部分不能被称为生殖灵魂？第三，食物与被营养者的关系究竟是相同者与相同者的关系，还是相反者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疑难。

田书峰：《理性与爱欲：〈理想国〉与〈会饮〉中的两种灵魂图景》

中心成员田书峰副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发表文章《理性与爱欲：〈理想国〉与〈会饮〉中的两种灵魂图景》。文章指出，柏拉图在《会饮》和《理想国》中为我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灵魂图景：一是爱欲或爱若斯(Eros)向着美的理念自身的一种和谐的攀升模式(ascent model)，二是在灵魂的理性部分与欲望和激情部分之间的一种冲突或斗争模式(conflict model)。这两种模式并没有任何内在的矛盾之处，而是对柏拉图的同一种实践主题的两种不同的描述：即欲求的秩序或逻辑。柏拉图在这两篇对话中虽然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实践哲学，但这两篇对话却为后来的实践哲学奠定了不可取代的形而上学基础：道德心理学，即灵魂的三分结构和爱欲的本性。理性的统治才是个体灵魂的最佳结构，爱若斯的最终目的是对美的理念的静观，只有

在对美和善本身的静观和沉思中才找到了让自己安顿的栖身之所，而灵魂的理性部分通过哲学教化和对智慧的爱而摆脱激情和欲望的奴役，走向个体的正义之境。

凌菲霞：《马克思中学时期哲学世界观的习得与发展创新——基于马克思与中学同班同学德语论文的对比》

中心成员凌菲霞副研究员在《哲学动态》2024年第2期发表文章《马克思中学时期哲学世界观的习得与发展创新——基于马克思与中学同班同学德语论文的对比》。文章指出，马克思中学时期的哲学世界观突出地反映在他的中学德语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即围绕择业问题表达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宗教观。学界关于此文引发了一些争议性话题，包括该文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以及该文所体现的马克思早期思想来源和发展问题。将该文与马克思同班同学的论文进行对比，是学界尚未注意到的考察路径，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传记学研究的必要补充。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来源或习得主要体现在他与同班同学论文的相同之处，即相似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观点、类似的人性人生观和为人类谋福利的价值观，这说明他们都吸收了中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和观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发展和创新则体现在其论文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在习得的基础上，他对社会条件的制约性、人的选择、自我决定等人生问题的理解比其他同学更宽泛、更深刻；二是他关于个人完美与人类幸福之间关系的理解新颖且独特；三是他更强调“神”的影响，很可能是虔诚的自然神论者。马克思当时的哲学世界观与后来的唯物史观是内涵不同的思想形态，所以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并无唯物史观的萌芽。

叶甲斌：《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

中心成员叶甲斌博士后在《现代哲学》2024年第1期发表文章《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文章指出，食利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形态，在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食利性首先表现为数字寻租。知识专利和平台数据成为食利资本主义获取租金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企业通过知识专利和平台数据构建数字领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提供条件。数字时代的食利

资本主义实现数字寻租，主要依靠两个核心机制：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它们之间的双重互嵌关系加强了数字食利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数字食利主义社会必然出现双向的趋势，即固化和不稳定化。一方面，食利者通过数字领域的垄断地位获取持续的租金收入，社会财富的分配呈现出极端的不平等，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另一方面，数字食利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工作与生活的不稳定性增加。对数字食利资本主义既可以从公地共同所有权出发，批判食利者对公地的独占和排他性获益的不正当性，也可以基于劳动过程，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夺。

叶甲斌：《“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与范帕里斯论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

中心成员叶甲斌博士后在《学术研究》2024年第3期发表文章《“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与范帕里斯论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文章指出，范帕里斯是基本收入的首倡者和捍卫者，长期为基本收入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范帕里斯早期为基本收入辩护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然而，范帕里斯的这种理论努力在1987年遭到罗尔斯以“马里布冲浪者”为例的拒斥，而后陆续就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问题形成了著名的“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的“马里布冲浪者批判”，表明了他对政治共同体中社会成员之间公平的合作体系的重视。范帕里斯在随后的著作中回应了罗尔斯的批评，从“最大最小化”真实自由到共享礼物的社会机制为基本收入提出辩护。这场“马里布冲浪者”之争，体现罗尔斯与范帕里斯分配正义理论预设了不同的社会想象，对于批判思考分配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盖伊·斯坦丁著，张超译、叶甲斌译校：《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

中心成员叶甲斌博士后在《现代哲学》2024年第1期发表译文《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作者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为当代西方知名劳动经济学家，译者张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文章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食利资本主义的现象。由于全

球化、持续的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劳工与社会政策等多重影响，食利资本主义中形成了新兴的大众阶级，即不稳定无产者。与其他阶级相比，不稳定无产者的独特性体现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不确定性愈加突出，大多数人陷入脆弱的处境。这无疑迎来了重要的转型时刻，在这场转型过程中，基本收入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本收入不仅可以在正义、自由和安全这三方面加以证成，在经济上也是可证成的。基本收入当然不是灵丹妙药，但如果一个社会想减少长期的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弊端，它可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